

# 龙门石窟妇女造像及相关问题

杨超杰

**内容提要：**龙门石窟造像主的身份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有大量窟龕的造像与妇女有关。本文通过对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进行归纳、整理，对涉及妇女的造像主身份、造像目的、造像题材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龙门石窟 妇女 造像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区南端。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东西两山满布着大大小小的窟龕2300多个，状若蜂巢。开凿这些窟龕的造像主，上至皇亲国戚、权贵大臣、地方官员、比丘、比丘尼，下至平民百姓，正是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龙门石窟艺术。龙门石窟有大量窟龕的造像与妇女有关，其中包括造像记中明确记载和通过窟龕内的供养人造像可确定的，其数量众多。本文通过龙门石窟造像记和文献资料中有关妇女造像的记载，对其做一系统的调查研究。

## 一 妇女造像的界定与数量

龙门石窟中与妇女有关的窟龕造像分三种情况：第一，妇女作为造像主开凿的窟龕（图版一：左上）；第二，妇女作为开窟造像的承载者，即因妇女而开凿的窟龕（图版一：右上）；第三，妇女之间、夫妻之间或者妇女与其他男性共同开凿的窟龕（图版一：下）。这三种情况都与妇女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即以此为基本线索，对石窟中的这一题材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

龙门碑刻题记的数量，以往记载最多的当为3600多品一说<sup>①</sup>。随着时间推移与世事变迁，至20世纪70年代，龙门文物保管所经过数年的详细调查、记录及拓印，共存2800多品，这一成果以出版的《龙门碑刻题记汇录》为代表<sup>②</sup>。需要说明的是，该专著中的条目含有一定数量的游记与纪胜碑刻资料，不是纯粹的造像题记记录。本文以此专著为基础，统计出有关妇女造像的造像记共有1000余品，若剔除与造像无关的碑刻资料，这一数量占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总量的近一半，由此可见妇女造像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龙门石窟中妇女造像的有关问题，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姓氏、郡望、妇女地位、人际关系、造像题材、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大量细致、繁重的具体工作要做。故本文内容仅论及妇女造像的几个问题，主要通过妇女造像的造像主身份、造像目的、造像题材等三个方面来归纳、总结，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 二 造像主的身份及相关问题

### （一）妇女造像主及与之相关的男性造像

杨超杰，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省洛阳市，471023

主，主要有三种：

1. 皇族与官吏。开凿窟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所开窟龕具有规模大、艺术水平高超、充分代表当时艺术成就和审美取向的特点。其品位大致分为：

(1) 皇帝。已经明确的有北魏宣武帝为其亡父母（即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追福而开凿的140和159窟（宾阳中洞和南洞）<sup>③</sup>；唐高宗所建的1280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龕），在这项工程中，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1637）<sup>④</sup>。140窟的造像是北朝时期石窟造像中中原风格的杰出代表，1280窟群像则是唐代雕刻艺术乃至世界雕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扛鼎之作。

(2) 皇族造像。有北魏广川王祖母太妃侯（2272）、北海王国太妃高（2288）、安定王元燮（2303，图一）等；唐代有纪国太妃韦氏（0465）、道国王母刘□妃（1466）、濮王妃阎（2539）、魏王李泰（0074）、中山郡王隆业（2739）、豫章公主（0149、0151）、淮南公主（018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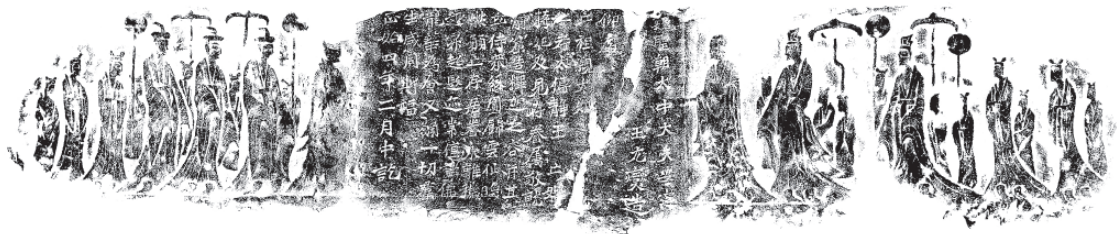
皇族造像集中出现在龙门石窟雕刻的北魏与唐两个盛期。北魏有3例，全部位于1443窟（古阳洞）；唐代7例，主要集中在159窟，有4例。有唐一代，石窟造像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单独开窟造像，其中以403窟（敬善寺）、1499窟、159窟（魏王李泰，利用北魏未完工的洞窟）为代表。这一现象进一步诠释了此类

窟龕规模大、艺术水平相对高的特点。

(3) 大臣与地方官吏。自一品至九品均有，按职事官和散官分别简略统计如下<sup>⑤</sup>：

职事官计有各个级别之参军、都督府户曹、太子文学、州长史、大监（图二）、尚辇官、前侍中、州司马、郎将、都督府长史、紫内司尼、王府录事、步辇郎、关功曹、立仪都督、左玉铃卫将军、州司户、州刺史、州司仓、太子典设郎、洛阳宫留守、秘书郎、吏部尚书、县主簿、司巫少常、内侍省、宪台令史、典书、参军事、县尉、左部都尉、吏部主事、千牛、秘书少监、行少府监主簿、典卫、羽林监太官丞、县丞、轻车都尉、左藏令、府校尉、长秋丞、宫内作大监、骑官、国常侍臣、国学官令、太中大夫、护军府史、城门郎、前御史、右骁卫郡、内常侍、县令、水衡监都尉、司列主事、内谒者、推官、录事、东台主书、公府长史、尚书左丞、司空公、羽林监、太官丞、州大中正。

散官计有登仕郎、强弩将军、陪校尉、柱国、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魏简卢公、宁远将军、太中大夫平南将军南面大都督、县开国公、戎昭将军、平东将军、县开国男、县开国伯、使持节征北大将军、薛国公史、右领军将军柱国京兆公、文林郎、偏将军左部都尉、荡寇将军、朝议郎、上柱国、阳烈将军、朝散郎、员外郎、平东将军、武卫将军、使持节都督汾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图版四：上）。



图一 古阳洞右壁北魏正始四年元燮龕供养人像及题记拓本

在造像记中出现的这些官职，大多数是造像记中的前缀部分，即表明其身份用的。分为三种情况（表一）：第一，某某官职之妻或夫人造像或者为官吏造像等；第二是官吏夫妻共造；第三是官吏本身为其家人祈福而敬造的。

表一 妇女造像中与官吏相关的数量统计表

	妇女	夫妻合造	官吏	合计
数量 (例)	27	13	40	80

## 2. 僧尼

僧尼的造像资料共有122例，其中比丘尼造像（图版二：左下）有100例，比丘为女性造像有22例。在造像活动中，僧尼不但直接从事了此类活动，而且还充当“邑师”的角色（图版二：右下）。另外，造像记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寺院资料，其中尼寺有8个，计有清明寺、许州仪凤寺、唐州觉意寺、唐都景福寺、神都宁刹寺、乾灵寺、麟趾寺、妙音寺；僧寺有西京法海寺和大统寺两个。

## 3. 平民

在相关的女性造像中，平民的造像数量庞大，但所造像龕大多规模较小。造像记中大量存在着“某某娘造”等简略的文字记载（图版二：上）。

（二）通过分析可见，这些造像主和造像记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 1. 古代的婚姻状况信息

张一川造像记（0009）是一则家族造像的记录，造像记中出现“妻姚氏赵氏”，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一夫多妻制的史实。刘宝睿在两年时间内共造像三次（1789、1790、1791），其中在仪凤二年为亡妻赵二娘造像两次；仪凤三年，新娶妻子范氏为妊身造药师像，反映了刘氏在妻子亡故后即续

娶范氏为妻这一史实。

### 2. 团体造像的特点

龙门石窟中的团体造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系女性与自己的家人一同造像。这种情况自北魏至唐均大量存在，多数为夫妻合造，合家造像也是一类重要的表现形式（图版三：上）。第二种情况即社团造像。在北魏时期，社团造像中成员绝大多数均系男性，只有极个别的造像团体有女性参加。到了唐代，女性大范围的参与到社团造像中来。在洛州乡城老人佛碑（0048）、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0077）、菩萨诃色欲经（2703）等造像碑铭中均有具体记载，反映了随着时代的推移，广大妇女已逐步参与一些团体的佛教信仰活动，并显示出逐渐加强之势。

### 3. 宗教化名字的大量出现

古代妇女在出嫁后，只有姓氏而无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称谓往往是夫姓在前，本姓附后，一般为某门某氏。随着妇女参与佛事活动的增加，一些妇女为自己起了一些非常宗教化的名字，这些名字一般是根据佛教中的神祇、佛教人物、佛教名词以及佛教名胜地为据而名。



图二 万佛洞正壁唐永隆元年供养人像

(1) 神祇类, 计有菩萨、婆罗门、树提伽等。

在1443窟左壁相邻的两个小龕中的造像记(1889、1890), 造像主均为宋菩萨, 她分别为亡父宋侈和亡夫张阿禄造像。菩萨, 菩提萨埵之略称, 又作菩提索多, 意译为道众生、觉有情、大觉有情、道心众生, 意为求道求大觉之人、求道之大心人。菩提, 觉、智、道之意; 萨埵, 众生、有情之意。即是以智上求无上菩提, 以悲下化众生, 修诸波罗蜜行, 于未来成就佛果之修行者。

在1443窟左壁的又一则造像记(1980)中, 出现姓王名婆罗门的名字。婆罗门, 意译为净行、梵志、承习等, 是古代印度四种姓中处在最上位的僧侣、学者阶层, 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 自认为是印度社会的最胜种姓。外来因素浓郁名字的出现, 可能寄托着深深的希求和对佛教知识的渴望。

在521窟(双窑)内存有大娘树提伽造像记, 在565窟(惠简洞)内还有一则树提伽的造像记。树提伽, 又译为聚底色迦、殊底色迦等, 意译为星历、有命、火生、光明等。他本是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 佛弟子之一。他的出生极具神奇性,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28有详细的记载, 此不赘述。

(2) 佛教人物, 计有迦叶、文殊、善胜、观音等。

1518窟中的一例造像记(2574), 供养人中有“女迦叶”的题名。迦叶, 全名大迦叶、摩诃迦叶, 又作迦叶波、迦掇波等, 意译为饮光。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付法藏第一祖。生于王舍城近郊之婆罗门家, 为佛陀弟子中最无执著之念者。人格清廉, 深受佛陀信赖, 于佛弟子中曾受佛陀分予半座。佛陀入灭后, 是第一次结集的召集者。禅宗以其为佛弟子中修无执著行之第一人, 特尊为头陀第一。

在652龕的比丘尼僧达造像记中, 为其亡息文殊而造像。文殊, 即文殊师利, 音译为文殊师利、曼殊室利等, 意译为妙德、妙吉祥、妙乐、法王子等, 即人们俗称的文殊菩萨, 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与佛教般若经典关系甚深。

在1387窟(药方洞)的清信女赵善胜造像记中, 出现“善胜”的名字。善胜, 是拘那含佛之母, 其父名大德。

观音即观世音菩萨的简称, 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的菩萨。凡遇难众生诵念他的名号, 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在佛教信仰中, 其影响力极强。

(3) 佛教名词, 计有慈善、戒静、摩诃、妙法、菩提、真行、有相、莲花、优婆夷、法僧等。

在557窟(清明寺)左壁的造像记(0699)中, 供养人中有“周修福妻赵慈善”的题名。慈善, 慈, 十波罗蜜之一, 不愿己利, 为一切有情住于慈心; 而行此十德目之位, 即称波罗蜜地。波罗蜜即到彼岸、度无极、事究竟之意, 指由生死之此岸到解脱涅槃之彼岸。通常指菩萨之修行而言。善, 根据善与不善的性质, 分一切诸法为善、不善、无记等三性。善即能顺益此世、他世之法。依《俱舍论》卷十三, 善分四种, 分别为胜义善、自性善、相应善和等起善。

在159窟右壁造像记(0171)中, 出现了“亡妹戒静”的题名。戒静, 戒, 广义而言, 凡善恶习惯皆可称为戒, 一般指净戒、善戒, 特指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的戒规, 有防非止恶的功用; 静, 是十六行相之一, 观四谛时, 各有四种差别, 在此时所产生的行相共有十六种, 静即是灭谛中的第二行相, 是为治解脱是苦之见。

在159窟北壁李夫人造浮图及七佛像记中, 出现李夫人摩诃的名字。摩诃, 又作莫诃、摩贺、摩醯等, 意译为大, 是大、多、胜、妙的



意思。《大智度论》卷三曰：“摩诃，秦言大，或多，或胜”。

在557窟正壁的一例造像记(0710)中，出现“亡女妙法”的字句。妙法，其一，即正法，指真正之法，亦即佛陀所说之教法。又作白法、净法，或称妙法。其二，指无法比较不可思议之法，称作妙法，特指法华经而言。

在669窟中的清信女真行众胜造像记(0982)中，出现“真行”的名字。真行，又称侍真行者，为禅林职役名称之一。真，指祖师之真影；侍真，即是服职于真影堂之侍者。侍真行者则是职称低于侍真，从事真影堂诸杂役之僧。

在1387窟外的造像记(1747)中，有“为过去亡女有相”的字句。有相，佛教专有名词，有形相之意，与无相对称。

1443窟正壁的造像记(2238)中有“为妹莲花造像”的字句。莲花本是生于沼泽之草本植物，取为清净的象征，它出于泥而不染，有香、净、柔软、可爱等四德，比喻法界真如的“常、乐、我、净”四德。又因为莲花妙香广布，诸佛及菩萨大多以莲花为座。

1504窟(北市丝行龕)外的一例造像记(2558)中，供养人为“杨优婆夷”。优婆夷，又作优婆私诃、优婆斯、优波赐迦等，意译为清信女、近事女、近宿女、信女等，即亲近三宝、受三归、持五戒、施行善法的女众。

在712窟(莲花洞)北壁黄法僧造像记中，出现法僧的名字。法僧，即是佛教三宝中的两个，佛指佛法，僧指僧尼。

(4)佛教名胜地，仅敦煌一例。

1443窟右壁的造像记(2302)中，造像主即是“敦煌”。敦煌，即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三大佛教石窟之一。

以上四类名字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信仰的普及性，并与中国传统姓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 三 造像目的

(一) 龙门石窟中有关妇女的造像，其造像目的多种多样，总结起来共有以下几种。

1. 为自己家人开窟造像(图版三:下)。这种造像目的占绝大多数。自家人几乎包括了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有造像主的长辈如祖母、父母、翁婆、姑，并由此上延至七世父母；有夫妻之间互相造像，或为兄弟姊妹造像；有为晚辈如儿、女、外甥等造像，并扩展至合家眷属。需要说明的是，这类造像大部分是为亡者所造。

2. 为合家平安所造，其中也包括出行平安和归途平安(图三)。

3. 家中成员患病祈求早日痊愈而造。

4. 此外，造像目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诸如有家内鬼神不安、怀孕生子、出家、老师、生日、早相见、长寿、加官晋爵、无忧愁、报佛慈恩、鞠养之恩等。

5. 为泛目的而造像，体现着造像主的宽广胸怀和无限的仁慈之心。大致有以下几种，为皇帝、国祚永隆、法界众生往生净土、十方施主、业道众生等。

(二)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有关妇女的造像目的，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绝大部分造像是为亡者祈福而造，愿亡者脱离轮回之苦，上生天国，知遇佛恩。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龙门石窟造像的普遍目的(图版五:左下)。

2. 妇女造像的目的均是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而造，即愿亡者托生佛国，生者平安无疾而获福。不像一些男性造像，如唐代吏部尚书唐临在造像记中“奉为皇帝皇后殿下，临亡父母，及法界群生，愿普成正觉”，实际是为父母亡故而造像，形式上却表现为众生而祈福的“博大胸怀”。这



图三 669号窟左壁小龕下层唐代供养人像

是在妇女造像中很少体现的一个现象。

3. 妇女参与佛事活动，其动机与目的，相对来说比较狭隘，她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及身边非常具体的事情，较少涉及到佛教的其他方面；说明了妇女信仰佛教，从事开窟造像的活动，有着非常简单而直接的目的。恰恰是这一目的，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龙门石窟的庞大规模（图版四：下）。

4. 造像目的的种类除了为家庭成员外，还涉及接近20个方面的问题，但均为具体事例，绝少献媚时政方面的内容（图版五：右下）。

#### 四 造像题材

龙门石窟妇女造像的题材共有23种之多（表二），几乎包括该石窟造像的各种题材，反映出其信仰的普遍性。造像数量以阿弥陀造像为最多，达161例；其次为观音像，119例；另有释迦像60例，弥勒像32例，地藏像19例，药师像13例，业道像11例，其他造像题材明显减少。这一现象说明了几方面问题。

（一）社会信仰主流具体体现于石窟造像是佛教中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尊神雕刻。北魏时期信仰的尊神主要是释迦像，而唐代则是阿弥陀像、观音像、地藏像和药师像。在北魏和唐代均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弥勒像，其他造像

题材较少（图四）。

（二）妇女对佛教教理、教规不够重视，她们的造像内容一般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造像题材。北魏时期，佛教宣传所依据的主要佛经是《法华经》，其供奉对象主要是释迦佛。因此，这一时期妇女造像中的大部分为释迦像。有唐一代，随着各个宗派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净土宗的空前发展，阿弥陀佛、观音、弥勒等像大量出现，正是当时社会信仰的具体体现。三阶教的极度盛行，龙门地藏像的大量雕造恰是最形象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优填王像的出现，龙门的优填王像与玄奘自印度带回的旃檀优填王像及其所创立的法相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唐高宗初期，这种造像在龙门石窟的雕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存达110多尊；此时的妇女造像也紧追潮流，造优填王像达到了7尊，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信仰时尚的影响。当法相宗的影响日渐衰退后，妇女造优填王像的活动也就戛然而止（图版五：右上）。

（三）随着佛教在唐代的大发展，宗教信仰的日益民俗化、社会化，佛教造像活动受佛教教理、仪轨的束缚与影响也日渐减小（图版五：左上）。信仰佛教的原始动力发生了变化，寻找精神寄托，祈求幸福和果报的思想逐步占据着主导地位，严格按照佛理开窟造像的方轨逐渐被打破，人们对“西方三圣”、“华

严三圣”等的造像仪轨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予充分重视，他们在造像活动中所凿造的佛教神祇趋向简单化、世俗化。铺像的安排配置更加自由，无拘无束，不同宗派所供奉的主要尊神被有意无意地组合在一起，其目的只是祈福、供养之用。在龙门石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的小龕造像，明显显现出这一特点，同时在妇女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不按教理教规，单凭主观意志而配置的佛像组合比比皆是，弥陀与二观音组合，观音、药师、地藏组合，弥陀、观音、地藏组合，观音、地藏组合，七佛、地藏组合，弥勒、观音组合，释迦、观音组合，地藏、业道组合，药师、弥陀组合，观音、势至组合，药师、观音组合，阿弥陀、药师、业道、观音组合，阿弥陀、释迦、弥勒组合等均出现，这种造像组合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佛教造像的目的与信仰的简单化和世俗化。另一种情况是一个造像主在造像活动中多次凿造龕像，造像题材也不受教理的束缚。例如，弟子张敬琮母王婆在所造的两个龕像中，一个主尊为弥陀像，而另一龕的主尊则是道教的天尊像；齐州山庄县刘宝睿家所造的三个小龕中的主尊像分别为药师、阿弥陀和七佛像。

（四）在妇女造像中，不但世俗妇女在

造像活动中出现了任意组合各种神祇为一龕的现象，就连释门中的比丘尼造像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在比丘尼七□所造的两龕造像中，雕造出观音、药师和地藏像三种不同佛教宗派所供奉的主尊像；景福寺比丘尼九娘，在一个造像龕中也分别刻出了阿弥陀、观音、地藏像的组合；比丘尼净元龕则造出弥勒、观音组合；比丘尼□□女十二娘、四娘造出释迦、观音组合；比丘尼恩恩龕造出地藏和业道像的组合。这充分说明了在佛教界内部，宗派思想的世俗化步伐也是很快的。

（五）通过对造像题材的分析，反映了当时社会基层的信仰只重效果、不重佛理的社会现实，广大妇女在佛教信仰上主要追求祈福、平安等的信仰目的和当时社会的流行情况。

## 五 结 语

（一）通过对妇女造像中造像主身份的归纳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造像主身份的高低决定了石窟开凿的规模的大小以及造像艺术成就的高下；

其二，比丘尼造像的大量出现，说明她们在



图四 712号窟左壁小龕北魏供养人像



表二 妇女造像题材与数量统计表

造像题材	数量（例）	造像题材	数量（例）
阿弥陀像	161	观音像	119
释迦像	60	弥勒像	32
地藏像	19	药师像	13
业道像	11	无量寿像	9
优填王像	10	七佛像	4
佛塔	4	多宝像	3
卢舍那像	2	定光佛	1
千佛像	1	廿五佛	1
五十三佛	1	势至像	1
自在王像	1	天尊像	1
法华经	1	石桥	1

造像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其三,数量庞大的女性平民造像及宗教化名字的出现,表明佛教的深入人心和社会普遍性。

(二)在造像记中表明的造像目的,具有两个明显倾向:一方面,龙门石窟俨然成为一个为亡者祈福,求家庭平安的盛大道场,而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则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内容宽泛而具体的造像目的,说明造像活动针对性的强势和政治性、宗教性的弱化。

(三)造像题材的丰富多彩,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社会成为主流信仰和日益社会化、民俗化的趋势,基层信仰重效果、轻佛理是当时社会现实最明显的反映。

(四)妇女在社会发展中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体。妇女初为女儿时,受到家中长者社会活动和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以后的佛教信仰和佛教行为奠定了基础条件。为人妻时,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孝敬长辈是她们的基本生活内容,信仰佛教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为人母时,其言行必然对子女的心理成长造成深远的影响,有佛教行为的家庭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必然受到佛教的启蒙教育。妇女的这种特性造就了其在佛教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佛教活动的多样性。这种现象在社会发展

中是代代相传、循环往复的,带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心理行为和社会活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无可比拟的。

总之,中国妇女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佛教知识的普及和一般宣传均由妇女有意无意地起着传承作用,妇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最基本的民众基础。换言之,中国妇女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载体,中国佛教文化的厚重积淀在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随着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这一特征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 ①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准确数量无从考究,直至1915年,洛阳知县曾炳章所著《石言》载,龙门石窟存有碑刻题记3680种。
- ②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③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3页。
- ④ 1637的编号即是《龙门碑刻题记汇录》中碑刻题记的序号。因篇幅所限,造像题记的录文略去,不予收录,下同。
- ⑤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的官职资料内容丰富,有待于专题研究,故本文对官职的分析研究从略,仅予以简略介绍。

(责任编辑 霍宏伟)





龙门石窟古阳洞左壁北魏太和九年尉迟龕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739号龕左侧唐贞观廿年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韩氏洞前庭两侧唐龙朔元年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老龙洞左壁小龕唐代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万佛洞外左壁唐代供养比丘尼像



龙门石窟万佛洞左甬道唐代供养比丘尼像





龙门石窟袁弘绩洞正壁右侧唐代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唐字洞正壁小龕唐代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1443号窟正壁小龕西魏大统六年供养人像及题记



龙门石窟1443号窟左壁北魏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411号龕正壁右侧唐显庆五年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1204号龕左壁唐代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普泰洞左壁北朝供养人像



龙门石窟莲花洞右甬道小龕北朝供养人像